



山脊

——中国扶贫行动

● 孙晶岩 著

(下)





山脊

——中国扶贫行动

● 孙晶岩 著

(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1. 没有硝烟的战场

——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扶贫行动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众多原因和我们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到了1978年底，仍然有2.5亿农民处于贫困境地，靠国家救济和集体经济组织扶持解决温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调整过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我们的祖国走上了经济大发展、事业大繁荣的康庄大道。

“民以食为天”，共产党在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同时，还努力加强了贫困地区的土、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发展商品经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中央加重了对老、少、边、穷地区和“三西”地区的专项扶持，接着又对贫困地区全面实施粮、棉、布以工代赈计划，开展了交通扶贫、电力扶贫、水利扶贫、通讯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工程，使

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

当时，国家一方面要多收公粮，另一方面要给贫困地区拨粮，刚刚攒下的几个金元宝又要拿去补窟窿，可中国这块土地的窟窿却太多了，它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啊！

贫穷的阴影笼罩着共和国的上空，贫穷的现状煎熬着共和国当家人的心。80年代初期，胡耀邦总书记迈开双腿跑了山西、湖南、贵州、云南等贫困地区，亲眼看到了林区、黄土丘陵沟壑、水库库区、西南喀斯特地貌的本来面目。他马不停蹄地奔走着，连春节都在下面搞调查。

1984年春节，林业部部长杨钟家里的电话一大早就响了起来。他以为是某个人的拜年电话，便漫不经心地拿起了听筒，里面却传来了李秘书急切的声音。李秘书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他这么早打来电话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

“杨部长，耀邦同志让我告诉你他这次跑了很多山区，看到大片的山荒着，水土流失严重，国营林场管得很严、统得很死，柴在山上烂，人在家里穷。看到这个状况他心里非常着急，想找你以及有关人士谈一谈。”

几天之后，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袁宝华、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瑞山等人就被胡耀邦同志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就如何改变中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会诊。

中国的贫困面很大，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突然胡耀邦同志高声地说：“把地球仪搬来，咱们对着实物说！”

地球仪被搬到了会议桌前，大家转动着地球仪，畅谈着自己的想法。地球仪虽然很大，可中国占的比例毕竟太小

了，大伙儿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围着地球仪盯着看很费眼神。于是，胡耀邦同志又招呼大伙儿：

“来来来，咱们还是来看地图吧！”

大伙儿站在了大幅的中国地图前，熟悉农村情况的李瑞山同志在地图上指指点点：“这是沂蒙山贫困片，属于东部丘陵山区贫困类型；这是武陵山贫困片，属于东西部接壤地带贫困类型；这是乌蒙山贫困片，属于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类型；这是吕梁山贫困片，属于黄土丘陵沟壑贫困类型……”

那天，大家畅所欲言谈了很多很多，每个人的心都被激情的火焰所点燃，都像热血青年那样盼望着为祖国的扶贫事业做点什么。

胡耀邦同志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兴奋地说：“咱们干脆开个座谈会，把全国贫困片的地委书记都请来。杨钟，你去列一个会议代表的名单！”

从怀仁堂出来，杨钟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知道总书记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回到家里，他顾不上休息，连夜查阅资料，把全国贫困片的30多个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列了一张清单，火速送交胡耀邦总书记。

几天之后，来自全国十几个贫困片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就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他们应胡耀邦总书记之邀兴高采烈地前来参加关于扶贫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持，整整开了5天时间，胡耀邦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了会议，并与全体代表照了相，给与会代表以极大的鼓舞。

与会代表都是战斗在贫困第一线的父母官，对当地的贫困现状十分了解，对如何摆脱贫困也有着很多真知灼见。尽

快消除贫困是大伙儿多年的愿望，看到总书记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哪个人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为早日摘掉贫困帽子来开会，哪个人发言不掏出心窝子来？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说着，智慧在讨论中碰撞出激情的火花。

胡耀邦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伙儿说：“咱们要有水快流，要挖掘矿产资源，建小煤窑。对贫困地区要进一步放宽政策，林区要山上管严、山下搞活，开放竹木市场，允许自由出售。非贵重药材就放开让农民采嘛，像麝香、杜仲、厚朴、甘草这些需要保护的药物资源，让农民到指定的收购部门出售。”

接着，他还就贫困地区如何打翻身仗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中央办公厅周杰副主任立刻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胡耀邦总书记把这份纪要递到杨钟手里：“杨钟啊，你好好看一下，这里面好多问题牵扯到林业问题呀！”

杨钟迅速地浏览了一遍纪要，建议立刻送有关部委传阅，请他们补充意见。

会议纪要正准备向各部委下发，胡耀邦同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咱们不要搞会议纪要了，要搞就搞个正式文件。为了把文件落到实处，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来具体抓这件事，由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

1984年9月30日，在祖国母亲35岁生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正式出台了，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中发〔1984〕19号文件。

文件指出：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使用，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

通知要求对贫困地区要明确指导思想，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增加智力投资，加强领导，彻底纠正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给贫困地区的农牧民以更大的经营主动权。

这个文件定得十分具体，甚至连耕地承包期的年限，减免农业税的年限都具体规划出来。凡是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允许当地农民在划定地段内依法集资开采；凡是国营企业单位无力经营或经营得很不好的山场、水面、矿藏，可以包给农民经营。一切农、林、牧、副、土特产品，包括粮食和木材、竹子，都不再实行统购、统派方法，改为自由购销。

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就贫困问题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发出文件，这是扶贫的总动员令。

好比是天上掉下一场及时雨，这个文件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群众的手脚，使贫困地区的山区林业、畜牧业、加工业、采矿业有了飞速的发展。

1986年初春，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率领三个考察组，奔赴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贫困地区，了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农民的生存现状。

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正式成立，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当时的农牧渔业部顾问林乎加担任顾问；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副部长朱荣、国家经委顾问李瑞山、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副组长；杨雍哲同志在担任副组长的同时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甘

肃省政协副主席黎中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委、民政部、财政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交通部、卫生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银行等国务院 18 个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为领导小组的成员。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四个处：综合处、政策研究处、规划协作处、“三西”地区处。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社会处。

这个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制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贫困地区开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工作，总结交流经验。

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朱荣主持。朱荣这个刚毅的山东汉子解放后长期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对中国的农业问题了如指掌。1986 年，年近耳顺之年的朱荣从农业部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挑起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重担。

朱荣永远忘不了当年乡亲们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的情景，他的心永远和中国的老百姓紧紧地贴在一起。他总爱穿一身中山装，脚踏一双解放鞋，手里拎着一个布口袋到乡下去，他那坚实的足迹遍布祖国每一个贫困的角落。他去过秦巴山区贫穷的南江县，去过武陵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去过偏远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去过沂蒙山区的穷乡僻壤，去过江西革命老区，每到一户贫困户的家中，他总要摸摸粮袋里有没有粮，看看床上的铺盖厚不厚，尝尝锅里的饭菜香不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建国快 40 年了，还有这么多农民兄弟不得温饱，我这

个抓农业的人有愧啊！”

朱荣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个不停。他每年不定期地组织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扶贫的政策和措施，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带动下，全国各个省区的扶贫领导小组如雨后春笋般萌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一个个坚强的扶贫战斗堡垒。

在扶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朱荣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冲锋陷阵。贫困山区的奔波劳作，长年累月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了肝癌。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先是在沂蒙山区主持召开北方片扶贫工作会议，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济南，尔后又奔往大别山。超负荷的工作连坚硬的金属也会断裂，这个刚强的山东汉子终于被病魔撂倒了。他顽强地战斗在火线上，拖着虚弱的身体又去了江西老区。这是他最后一次前往贫困地区了，从江西回来之后，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病理报告单上残酷地写着四个蓝色的大字：癌症晚期。

1990年2月，在一个北风呼号的寒冷日子里，朱荣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我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采访时，很多人含着眼泪向我提起了朱荣：“朱部长真是活活给累死的啊！”

谁说和平年代就没有牺牲，在扶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朱荣同志不正是用鲜血催开了朵朵红花吗？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最引人注目的一招棋是扶贫开发方针的转变：由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由零敲碎打扶贫转变为整体扶贫；由发钱发粮扶贫转变为搞经济开发。

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在山区，而中国大江大河的源头也正是在贫困地区。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们世代代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库区，我看到了地球赤裸的胸膛，那大片的喀斯特地貌，不正是地球活生生的白骨吗？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在阴阳五行说中，就是金、木、水、火、土配备不全。一般说来，西北部地区只有土缺少水，而西南部地区则又有水无土。我国的石山区占了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贵州省的很多地方根本没法丈量土地，只好用打下的粮食来估算土地的面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口的恶性膨胀，资源的过度超载，如果不及时治理，涛涛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1992年冬天，我站在长江的源头沱沱河畔，静静地谛听着母亲河的呜咽，心像利刀绞割般地疼痛。解决当代人的生存问题，改善生存发展的条件，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了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

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这个扶贫总指挥部的率领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了1993年，我国的贫困人口还剩下8000万，这8000万是块硬骨头啊！

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1996年3月，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专门研究扶贫问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就中国的扶贫现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这个汇报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刻指示让全体政治局委员

听取和审议扶贫工作的汇报，制定了扶贫攻坚的目标和措施。

几年来，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会，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认真听取陈俊生等同志关于扶贫工作的汇报。四年就召开了三次各省、区、市党政领导同志参加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为了推动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在1996年的9月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要求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准备好全部的会议文件。

从1996年年初起，整个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上至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钟、杨咏仪和办公室几位主任，下到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为会议文件的制定付出了心血。扶贫办公室编制是25人，可当时还缺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减少干扰，他们在一个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把电脑和四通打印机搬到了那里，对外封闭起来集中精力形成拳头写材料。如果说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打了七天七夜硬仗的话，那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们在扶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了把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好，却整整坚守了半年。

这次动笔杆子可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这是一场科学的战役，温饱线的尺度定得多高，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时间定得多长，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多少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户均多少亩林果园或经济作物，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多少个劳动力，户均多少项养殖业或其它家庭副业，牧区户均多少个围栏草场或草库仑，这些量化的指标都需要一一进行科学的论证。

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妻子儿女？可是为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圆满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昼夜奋战，准备会议文件。他们有的把生病的孩子扔在家里，有的把病假条揣在兜里加班加点，有的妻子刚好赶上出国、出差，孩子在家里无人照料。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同志的儿子正好赶上考学，妻子是多么盼望丈夫能够回家帮着做点家务，儿子是多么盼望父亲能够回家帮着复习功课啊，可是为了把文件起草好，王国良一连几个月坚守在招待所，儿子的大事没有帮上一个指头的忙。

杨钟同志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早在1982年，50岁的杨钟就当上了林业部部长，是我国当时最年轻的一位部长。1991年，他来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担任专职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之后，立即率领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一道前往秦巴山区的陕西白河县考察基本农田建设情况。那里海拔几千米，出门就是山，59岁的杨钟拄着拐棍爬了一座又一座大山，先后两次在秦巴山区呆了一个月，终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成功地在白河县召开了全国基本农田建设现场会。他患有肝炎和糖尿病，为了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好，他把病痛忘到脑后，带着药片住进了招待所，率领大家拼命苦干。

高鸿宾同志患有严重的颈椎病，长期伏案加班使他的脖子疼得像针扎似的，每转动一下脖子都要全身冒冷汗。他咬着牙带病坚持工作，连夜起草文件。一天晚上，由于一连几天的连轴转，他实在是累得吃不消了，不知不觉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谁知，就在那个晚上，他的老毛病胃痉挛犯了，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渗出，疼得他在沙发上直打滚。同志们急忙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中日友好医院，医生看过后立即以

急诊收住院，说如果再这样拼下去的话病情十分危险，必须好好休息。他躺在病床上心里还是惦记着工作，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他们终于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文件全部起草好，并且拟定好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问题的汇报提纲，得到了中央首长的肯定和赞扬。

1996年金秋，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为扶贫问题召开的一次大会，会议由朱镕基副总理主持，江泽民、李鹏、姜春云同志都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胡锦涛、丁关根、吴邦国、邹家华、姜春云、温家宝、陈俊生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中西部18个省区的党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在我国的扶贫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决定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扩编，由25人增加到40人。同时增设宣传联络处，以加强扶贫的宣传和对外联络；增设区域协作处，主要抓东西部互助，加强东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沿海六个经济发达省和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四个城市与西部10省区的合作；增设统计分析处，主要抓扶贫资金的管理。

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确定贫困地区要把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为主要任务，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力增加扶贫投入，建立党政一把手抓扶贫和资金到省（自治区）、权力到省（自治区）、任务到省（自治区）、责任到省（自治区），限期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责任制；作出了贫困地区的党政一把手，特别是县委书记、县长在届期内保持稳定，有

功者奖，不负责任、无所作为、完不成任务的，就地免职或降职使用的决定。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条纽带那样，把党中央和贫困地区老百姓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及时地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作为一个扶贫指挥部，他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接连打了好几场漂亮仗！

第一场漂亮仗就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党中央、国务院起草了75份文件，提出了中国扶贫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等重头文件。

第二场漂亮仗就是大大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投入，中央的专项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扶贫信贷资金）由1985年的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153亿元。同时，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各部门的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1997年，中央还一次性地将股票售后收入的21亿元，拨给农村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使用。从1996年起的5年内，中央财政向西南、西北地区增加义务教育基金39亿元。各省、区、市对中央扶贫资金的匹配比例，已经由原来的19%上升到1997年的51.7%。1997年全国扶贫资金总量比199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第三场漂亮仗就是进一步落实扶贫攻坚责任制。全国扶贫工作除了实行以省（区、市）为主，“四到省（区）”的责任制以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涉及各部门的职责，由各个部门负责落实；县和县以下的扶贫工作，由各级各部门对口帮扶。他们组织中央党政机关和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的

124个单位，对口扶持334个国家级贫困县，占全国592个贫困县的56.4%；其它国家和省里定的贫困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厅局级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扶持。县级各部门包扶到乡、村，机关和企事业干部包扶到户。在全国的9399个贫困乡，70333个贫困村，都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包扶。不脱贫，不脱钩。

别看将124个中央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与334个国家级贫困县挂钩是件小事，这里面的划分学问大了。比如，为什么要把国家安全部的扶贫点放到岫岩，把公安部的扶贫点放到克东和杜尔伯特，那是考虑到当时东北的社会治安不够好的缘故；为什么要把中央统战部的扶贫点放到贵州毕节，那是因为民主党派中央智力支边长期与毕节挂钩的缘故；为什么要把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扶贫点放到河北围场，那是因为围场有著名的塞罕坝草原，有一望无际的林场的缘故；为什么要把交通部的扶贫点放到怒江大峡谷，那是因为怒江大峡谷是仅次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那里交通闭塞，不通公路的缘故……。

分片包干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比如青海省的玉树，就是个不大受人待见的孩子。那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令人望而生畏。开始把玉树分给甲单位，甲单位说那里太冷了去不了；后来把玉树分给乙单位，乙单位又说那里缺氧去不了。最后掂量来掂量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们一寻思既然玉树是块硬骨头，就应该把硬骨头交给能够啃硬骨头的单位。于是，他们想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他们原来担心再次碰钉子，谁知中共中央办公厅二话没说就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务。尽管玉树高寒缺氧，尽管那里条件艰苦，饮食习惯和内地千差万别，但是中共中央办公

厅的同志们却笑洒热血，无怨无悔。

贫困地区大多在山区，那里交通闭塞，道路狭窄。在我采访的扶贫点中，很多扶贫干部都遇到过车祸。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扶贫点在青海的玉树，那里山道弯弯，道路异常险峻，扶贫的干部在那里出了车祸，一位司机当场牺牲。眼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转眼间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被撞伤了的徐永元同志丝毫没有退缩。他带着伤痛在那里艰苦奋斗着，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扶贫任务。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到青海考察时，还专门接见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在玉树扶贫工作组的同志。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扶贫点在云南的西畴，扶贫干部王向东遇到过一次车祸，却始终不敢跟妻子说。扶贫干部赵凤祥两次遇到车祸，第一次撞伤了左肩膀，第二次撞伤了右肩膀，他不但没有吭一声，反而幽默地说：“这下可好了，一左一右撞平衡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扶贫点在贵州的赫章，扶贫工作组的第一批干部还没有到达赫章，车祸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一位干部的腿撞伤了，另一位干部的眼睑撞破了，他们不但没有畏惧，反而笑着说：“这下好了，越撞越漂亮，回去不用纹眼线了。”

车祸、疾病像瘟疫一样残酷地吞噬着扶贫干部的生命。不要说普通的扶贫干部了，就连温家宝同志到贵州的毕节考察，都遇上了两次车祸。温家宝同志在车祸面前勇往直前，为人民作出了榜样。

现在，在中央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挂钩的334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已经有一些贫困县摘掉了贫困帽子。在扶贫攻坚的战场上，洒下了扶贫干部多少汗水和鲜血啊！

第四场漂亮仗就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中央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科技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新闻扶贫、巾帼扶贫、康复扶贫、富帮穷，扶贫送温暖和兴办温饱工程、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博爱工程、思源工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智力支边、光彩事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驻地扶贫、民兵扶贫，香港中国星火基金会、香港中国老区发展基金会、香港演艺界等社团和港澳台同胞、华侨、华人等开展了扶贫捐赠等活动，为农村扶贫济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三年来，遵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的捐赠衣被活动，并将募集到的 30 多亿件衣被、收到的近 20 亿元的捐款全部捐献给贫困地区。

第五场漂亮仗就是组织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沿海六个经济发达省，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四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 10 个贫困省区。其中北京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浙江帮四川，山东帮新疆，辽宁帮青海，福建帮宁夏，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全国支援西藏，以富帮穷，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东西互助是促进东西部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仅 1997 年以来，东部省市已经向西部省区捐款 4 亿多元，赠送了大量的物资，签订合作项目 1029 个，协议投资近 60 亿元。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国的中西部虽然贫困，可也是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东西部互助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六场漂亮仗是积极发展与国际组织在扶贫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